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〇一期 ——  
(二〇〇九年五月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905b)

---

【史海钩沉】	林彪之垮台——重探 1970 年庐山会议与国家主席问题	孙万国
【文革一页】	1968 年：中国“五七”干校之滥觞	李城外
【名人轶事】	张春桥与王洪文鲜为人知的“婚事”	沈国凡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林彪之垮台——重探 1970 年庐山会议与国家主席问题

• 孙万国 •

(澳大利亚 Monash 大学)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共高层政争中，林彪事件迄今仍然是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椿。然而，若与九一三之夜和林彪折戟沉沙等枝节问题相比，更为关键的则是林彪在文革中的角色与当时中共高层政治如何运作等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曾在与泰伟斯合撰《林彪的文革悲剧》(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urst, London, 1996) 一书中试加探讨，其结论颇与时下学界流行的解释大相径庭。简要说来，中西学界的官方或主流观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1. 林彪是野心勃勃的政客，为了强化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统制，又为了巩固其接班人的地位，不择手段地从事政治阴谋与派系斗争，以恣其欲。这包括他在 1970 年为了出任国家主席，夺权强班，却惨遭滑铁卢的企图。

2. 林彪是高唱文化大革命的中坚人物。特别是在 1966 至 1968 的文革高潮期间，他跳得最高，嘴上最左，积极鼓吹和支持一系列破坏国民经济的举措。他不惜打乱军队，只有

在危及自身“山头”的时候，才稍稍见其节制。

3. 尽管初时毛林结盟，但自文革进入“整建”阶段时，亦即九大前后，两人关系便已开始恶化。林彪自感接班人的地位不保，发动了一场阴狠无情的权力斗争。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风暴，便是明证。

4. 除了毛泽东，林彪的主要政敌为周恩来。周组成了一个反林同盟；而林彪则与先前的“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的前身）相互勾结。

5. 九大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林彪企图把持武人当权的绝对优势。毛泽东与周恩来则力图恢复文官政府。

6. 为了固守权力，林彪推出了一套政策性的方针。即在国防上大喊备战；在外交上力主强硬；在经济上则近乎当年的“大跃进”。其用意不外乎迎合军方与大工业部门（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共同利益。无奈这一套方针斗不过力主温和政策的文职干部与地方军头的联手抵制。

笔者掂量了各种证据之后，认为上述诸条都带有严重的漏洞。对比之际，笔者关于林彪事件的评析，概可撮要如下：

1. 林彪算不上权力薰心之辈。其实他甚惬意于位尊却不管事的荣誉性虚职。他之步上权力舞台的前沿，原本出于毛的旨令。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后来终于遭毛遗弃。其垮台的原因实与他是否包藏野心，关系不大。

2. 林彪既为钦定接班人，在公开场合上，出于职责，自当拥护毛所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间他大约也不免藉机打压其他山头。然就其个人行径与私下言谈观之，林彪实则未必认同文革，反倒是倾向于经济之发展与情势之稳定，尤其是军队之稳定。

3. 林彪从未在政治上反毛。反之，他严守“主席划圈我划圈”这条毛记宫廷政治里的金科玉律。奈何“主席的意愿”未必容易理解。即便在庐山会议后情势急转直下期间，他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当年赠予陶铸的忠告：“被动、被动、再被动”。至于所谓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和暗杀毛主席的阴谋，从现有的证据看，林彪未必知情。

4. 林彪与周恩来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一者周安然臣服于林的长官地位；二者，林从不干预周总理的国务院活动。其实，真正的矛盾倒是存在于林彪一伙与江青集团之间。其冲突的根源，在于竞相争取毛泽东的恩宠。但也因为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不容置疑，双方之较劲，只能纠缠于鸡毛蒜皮之表面事务，而少涉及重大政策上之分歧。彼此又深恐对方权力之膨胀，故矛盾愈演愈烈。

5. 文职干部与枪杆子之间，诚然因为职权上的摩擦，在党内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然而并无迹象显示林彪一伙企图建立起拿破仑式武人执政的格局（Bonapartism）。

6. 基于自身利害，林彪有必要呵护军队在国家体制中所能摊得的利益。军方组织在文革中奉命监管经济时，也确实扮演过关键的角色。但硬要说林彪形成一套讨好“军工体系”（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经济方案，则恐怕是查无实据的臆说。其实在1966至1971年的整段期间，林彪不管经济，根本谈不上有何经济政策。

以下本文，摘自笔者与泰伟斯的《林彪的文革悲剧》英文版一书中有关九届二中全会及国家主席问题的部分篇章。盖此二题，在整个林彪事件的推演中，至关重要。笔者试从当时的历史脉络，考察这一引发毛林失和并导致林彪垮台的重大事故。

不论是中共官方，或者是西方学界，都把1970年8、9月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形容为林彪文革生涯的转折点。在庐山上，由于“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椿问题，使得毛林关系出现了决定性的恶化。这一描述，固然不错，然而学者们在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诠释时，则不免沾染某种政治意味，盖其诠释大抵植根于毛泽东本人对此事件的论断，认为林彪自感处境不稳，必须在政府机构中取得一个高踞于周恩来之上的职务，才好巩固其接班人的地位，因此觊觎国家主席。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还认为林彪所以自忖前途未卜的理由有二：一是，毛询问林的健康状态时，曾透露出可能让张春桥接班的考虑。二是，江青的势力逐渐坐大（西方学者则爱说周恩来的势力膨胀，对林彪构成了威胁。）总之是说林彪有心猎取国家主席一职。既然身为老二，只能请老大先当，但心里则盘算一旦毛主席不干，这一职位自然落其手中。岂料毛虽然自家不干，也不欲他人觊觎，乃责令废除国家主席一职。无奈林彪利欲熏心，一意坚持，这就招来毛的忌讳。毛泽东从此怀疑亲密战友的忠诚，一系列对付和铲除林彪的步骤于是展开。（1）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然如此么？

关于争论国家主席的经过，除了若干关键细节外，大抵历历可察。（2）原来中央认为文革既已进入整建阶段，1970年底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国家宪法之举遂提上了讨论日程。国家主席的问题也就不可回避。1970年3月初，毛在考虑国家新体制时，首先提出废除国家主席一职。翌日政治局就此开会通过。按说毛一锤定音，事即可了。林彪随后却于4月间重提此事，并建议毛担任国家主席。毛再度表明无意出任（按毛泽东后来声称在庐山会议之前一共说了六次不当国家主席。）（3）七、八月间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林彪的支持者与几位极左文人则为此事争执激烈。到了庐山二中全会揭幕时，林彪换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把国家主席问题，再度端了出来。林系人马则由陈伯达带头上阵，在会上着重大谈天才问题。二中全会的议程，遂为之改变。此后两天半的大区分组会议中，群情愤激，纷纷批判不承认毛是天才的观点。国家主席的问题也随之再次登场。然而毛也迅即出面干预，严厉指斥林彪一伙，并揭开一场整肃陈伯达的运动。至于对待林彪的态度，毛则较为暧昧，没有立即处置这位国防部长。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分析道：林彪拥有军队的支持，毛当时并无把握一定能斗垮林彪。（4）

上头这一描述，若就事状的进程来说，大抵不差。但若就事情的真相来说，则犹如一位国内军中史家所见，这类流行的官方说法，颇成问题。说到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林彪是否有心猎取国家主席一职。根据许多证据研判，他其实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那样。一向以审慎著称的大陆学者王年一教授就已经指出：“林彪是否对担任国家主席很感兴趣？叶群的阴谋活动是否出于林彪的授意？”这些都是吾人“无法断言”也“不得而知”的。只可惜他在著作中只是一笔带过，未再深入。而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则直截了当地认为，整个国家主席的问题都是出自叶群的馊主意。（5）有几位党史专家接受笔者访谈时进一步表示他们不认为林彪有意于主席一职。理由很简单：国家主席总要抛头露面，迎来送往的公务太多，全然不宜林彪怕光怕风的健康状态，也不符合他闭门不出的遁世性格。尤其是接待外宾，最令林氏头疼。（6）再说，林彪在1970年4月提议毛任国家主席时，就曾昭然明确地表示：“国家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关系不大”；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7）（按，换言之，林彪连副主席一职，都无兴趣。）最后还须指出，官方对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的指控，主要的证据，就是吴法宪招供的叶群所说的一句话：“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吴法宪多年后已经承认其供词中不乏杜撰之辞。何况，即便叶群说过此话，亦不足以证明林彪本人有此心思。则其非铁证，彰彰明矣！（8）

既然林彪无意为国家主席，何以他在毛泽东三令五申之后仍然坚持当设国家主席一职呢？笔者访谈过怀疑官方之说的某些学者。他们提出的解释是：林之推举毛当国家主席，只不过是履行“第二把手”应尽的义务，也切合他迎合毛的一贯倾向。（9）同样的，陈伯达之同声崇毛，也可解释为一位失宠的政客，为博回毛的信赖，所表现出的百分之两百的忠诚。学者们还认为当时的上层领导，姑不论是林彪一伙、其他政治局成员，还是各部首长，乃至毛身边的人物，或迟或早，皆相信毛泽东尽管嘴上说不，心里却是想的一一至少是会欢喜臣民屡屡劝进的那种荣耀。还有一说，则认为这一切全是毛泽东设下的圈套，故意误导林彪，伺机诱林入罪。对此一说，笔者不敢苟同。较为可信的说法，当是王年一教授之见：当时谁也吃不准。毛说不干国家主席，谁知究竟是真是假？底下的人只能自行判断如何应对才不出错。这一情况或者又如另一资深史家所言：毛惯于隐藏真实意图。林彪诸人只能自行揣度，心想给毛主席的头上再加一层光环，总不至犯大错误。（10）在此，读者不妨回顾一下周恩来在九大时候的表现。尽管毛泽东已明白批示不准其夫人进政治局，周恩来依然提拔江青为政治局委员，结果毛夫人还是进了政治局。此外周也曾不顾毛刚下过的禁令，照样使用了“天才地，创造性地”等副词形容毛的伟大。这么看来，林彪之坚设国家主席，请毛荣任，也就不是什么咄咄怪事了。何况后来在庐山上发生的戏剧，恐怕叶群才是真正的导演。林彪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沾边罢了。此一戏剧性之“冲突”者，未必就是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矛盾。真正的冲突大约还在于叶群与江青一伙的矛盾。这些问题，读者当可在下文看得更加明白一些。

1970年3月至5月间，在国家主席问题上，虽说毛林意见相左，但党内情况并无明显异样。最多只出现过一点苗头，可嗅出某种冲突意味。先是毛的警卫司令兼中办主任汪东兴于3月8日自武汉来京，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的意见随即得到与会者的同意。政治局并在3月16日就修宪中某些原则性问题向毛请示，毛也批阅了这一请示。不料在翌日召开的、历时四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修宪问题，还是出现了争议。林彪并未出席会议。但周恩来则报告说，会上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激烈。毛泽东知悉后，重申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11）数周后，即4月11日，林彪从苏州住处发电报给时在长沙的毛泽东，正式提议毛兼任国家主席，以满足“人民的共同愿望，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这显然是林彪亲自出面建议设立国家主席的唯一动作。也就是在此时，他表明了笔者上头所引的“设不设副主席，关系不大；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立场。当时林的意见也传达至政治局，获得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支持。（12）对此，据闻毛泽东报之一笑，谓“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按指董必武）！”毛泽东并于12日另作文字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这一不足为奇的训令，显然并不足以打消人们继续拥毛的议论。稍后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室还印发出两份不同的修宪方案，一份列有国家主席一章，一份则否。总之，到了4月下旬，毛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时至5月中旬，则据说林彪私下指示了宪法工作小组成员的吴法宪与李作鹏写上“国家主席”一章。（13）

以上诸事，如单就毛林关系而论，并不存在任何紧张迹象。然而到了炎夏时节，风云渐变。七、八月间，叶群在幕后数度与钓鱼台的头面人物齟齬，冲突明显升温。关于这段时间里的变化，史书所载，大多语焉不详。学者王年一曾经指出：“（这时）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是一个重要背景。”可惜他没有进一步交待两个“集团”里的具体都是哪些人赤膊上阵（比方说，包不包括周恩来？周又扮演什么角色？）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偏在此时出现了尖锐分歧？除了两个集团间的矛盾外，王年一还指出林彪与叶群之间也有矛盾，因此吾人无法断言林彪是否知悉或支持叶群的活动。（14）总之这段时间里，叶群与钓鱼台间的嫌隙转深。据张云生回忆：“七月的一天”，叶群趾高气昂地回到毛家湾，告诉秘书们说：“政治局开会讨论四届人大问题，争论可激烈啦！我站在多数一边，那个少数孤立了。”秘书们从蛛丝马迹中推断，所谓多数，包括了黄、吴、李、邱四大将与陈伯达。“那个少数”则指以江青为后台的康生、张春桥与姚文元等

人。争论的焦点则是毛出任国家主席一事。(15)从张文的字里行间,笔者还可推断江青并未出席此会。果真如此,则毛的真实意向,更教人难以捉摸。此外,周恩来的立场也值得推敲玩味。毛、林既然缺席,政治局会议当然由周主持。然而迄今未见有官方史料记载他在会上的态度。也许恰恰由于这一回避不提,使笔者有理由相信周恩来也在叶群所说的“多数”之内。姑不论如何,到了七月中旬,周恩来向毛汇报修宪小组里“有人”主张设立国家主席之时,毛泽东第五度明言废除。(16)

一个月后,情况更加恶化。根据官方记载,叶群于8月11日告知吴法宪:林彪仍然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吴法宪是否虚拟事状?叶群是否如实反映了林的意见,吾人碍难断言。但在此后数日的修宪争议中,并未触及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的人马反而是把争论的焦点转向其他修宪中的问题,即毛泽东尚未“明朗”表态的问题。如8月13日的宪法起草小组会上,吴法宪提议在宪法条款中加入“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句。此外,吴还要求加上三个(评价毛泽东的)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云云)”。按,前头的一条本是陈腔老调。后头的一条,鉴于先前九大时候的争议,则显得比较大胆。为此,张春桥、康生二人与吴法宪争吵起来。陈伯达亦加入战圈,支持吴法宪。从吴法宪在会上说起“‘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来反对毛泽东思想”云云,可以揣见这一冲突非同小可。但这一纠纷为何而起?笔者无从知晓。一说只有张春桥与康生知悉毛在九大前从党章中剔除过这三个副词。此亦似是而非之论,因为毛泽东曾经公开反对过使用这三个副词。不论起因如何,这场争端搅得叶群上串下跳,纠合同道,还让陈伯达与黄永胜编选“称天才”的语录;黄永胜也电召李作鹏前来开会,以壮声势。说来奇怪,次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与康生出乎意料地默不作声。结果吴法宪的提议“一读”就通过了。总的看来,这段时间里,对垒的双方虽未正面触及国家主席之争,剑拔弩张的暗流毕竟已经酿成,在不到十天后的庐山会议上,即可一见分晓。(17)

关于庐山上的风云,如今已不乏各色材料问世,说得非常仔细。可惜仍有若干关键性的空白,有待史家填补;也有许多推断,人言言异,莫衷一是。(18)按,庐山会议当从8月22日下午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说起,但史家对于这次会议的记载就有很大的出入。据中共中央党校于楠教授之说:对于“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已经有所察觉,故上山伊始,就呼吁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和失败的会议。但是林彪与陈伯达偏偏不听警告,重提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为此激怒,愤然说道:“谁想当国家主席就让他当吧!反正我不当。”并随即“严厉批评”了林彪。(19)但此一叙述,在与笔者晤谈的某位文革专家看来,完全不足采信。他认为林彪对毛一向紧跟,倘若已遭毛严厉训斥,岂会有次日会上的大发议论?从细节上来看,于楠之说也有时序错植之嫌。按林彪涉及国家主席之讲话,事在8月23日,其后两日群情唱合。然则22日时林彪尚未讲话,如何会招来毛之批评呢?在这点上,还是汪东兴的回忆比较准确。汪是与会者,也是当事人。他回忆上述毛的愤激之语,作于8月25日,也正是毛决意刹车,终止大会讨论国家主席问题的时候。(20)

九届二中全会在8月23日下午正式召开。据官方之说,事前并未安排林彪讲话。但在会前的常委碰头会上,当毛询问谁先发言时,林彪突然毛遂自荐。结果他在开幕会上讲了一个半小时。讲话中他并未单刀直入地涉及“国家主席”一词,而是强调新宪法有必要突出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最高统帅和“国家元首”的地位。按理来说,林的这一号召并不违背毛的指示。因为抽象的“国家元首”未必就指需要承担繁文缛节的“国家主席”这一实职。讲话中林彪还颂扬毛的著作和思想,又明言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并委婉地批评了不同意见。所有这些,诚如汪东兴二十年后说的,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当时在听众中却引起热烈的回应。根据一些出席者回顾,林彪开始讲话时,毛泽东还有点笑容;愈往下说,毛就显得有些木然,甚至面有愠色。汪东兴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总之,通俗之见都说林彪的讲话事先未经毛之批准;而待他讲完之后,毛已是满脸不悦之色。(21)

叶群之说则不然。她在当时就宣称林的发言预先征得了毛的同意。陈伯达多年后亦说，林彪当天散会后，同他谈过主席心里明白他（林）要说什么。好几位党史学者亦认为，林在事前让毛看过讲话大纲。（22）

后一说法显然较为可信。它不但符合林彪的崇毛风格，也符合当时党内上下领导之间的纪律常规——虽说事前再小心，也难保毛事后不翻脸。（23）至于所谓毛之明显不满林彪讲话，大约也是夸大不实之词。汪东兴要是真的觉察出主子的不悦神色，何以会热烈唱和林的讲话呢？此外，龙颜明显不悦之说，亦难解释此后两日数百中央委员在大会上讨论林氏讲话之热烈现象。这包括吴法宪提议改变全会议程（按原订议程为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国防战备及修改宪法），加上“首先听取林彪讲话录音”一项。这一建议显然获得全体一致通过。据汪东兴事后说，到会的人都附和吴的动议。周恩来也听从大家的意见。更妙的是毛泽东自己的反应。当次日上午有人建议印发林的讲话稿时，周恩来派汪东兴向毛请示，毛则答曰：“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24）

正如整个林彪“传奇”中屡见不鲜的现象那样，叶群的介入与搅和，使得情势益发错综复杂起来。林立果于事发后就向林办秘书张云生私下吐露：“叶群在庐山‘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而林彪则“事前不知情。”据官史所载，8月23日晚，叶群串连布置，给大将们下指示，出点子。这些点子，可看出叶的胆识。她说：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25）；要强调“三个副词”和“天才”问题；要在“毛泽东思想是全国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做文章；不要点名，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更不准有半个字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总之，鞭子要对准张春桥；否则，打击面太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显然，叶群的点子多少带有宗派之争的意味。三位大将正是领会了这个意思来到8月24日下午至晚间举行的大区分组会议。（26）

在分组讨论中，林彪的讲话无疑得到所有各组的赞同（妙得很，还包括了张春桥的上海代理人王洪文所在的华东组。）（27）不过最为戏剧化的场面却在华北组。陈伯达以事先准备好的“天才”问题材料，在华北组上慷慨激昂，大放厥辞。虽说他的福建方言难懂，但他想说的要害观点，大家全听得明白。他说：毛主席是天才，可是竟有人胆敢反对使用“三个副词”！还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一提法。与会者对陈伯达讲话的反应，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全体无异议，一致赞同；二是赞同者不分山头——内中最重要的当数汪东兴。汪是御林军总管，“一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但又与毛家湾关系密切。他对陈伯达讲话的全力捧场，显然对其他与会者的感染甚大。大伙儿自然会联想到，其中必有毛的首肯——汪可是主席身边的人哪！总之陈伯达与汪东兴联袂发言之后，群情顿时鼓噪，誓死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物揪出来“千刀万剐”。陈伯达在追问之下，才透露出指的是张春桥。据官史说，当“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的消息传至华东组时，只见张氏立即挨批，面目苍白，如坐针毡。

回头再说华北组。分配到该组的陈毅也发言表态说：要是毛主席愿意改变初衷的话，他完全赞成毛当国家主席。按陈毅上山之初，便得到汪东兴的暗示：全会准备批判“某人”（稍后才知“某人”就是张春桥）。（28）陈毅还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毛主席是天才……如今竟有人否认毛主席的天才，肯定是居心叵测。会上陈伯达也插话说：“有的反革命份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话音未落，全场愤慨；激动之余，便有人提议在我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并“热烈希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随后华北组印发了一份措辞激昂的简报，表达上述强烈的愿望，并要求揪出党内的坏蛋，斗倒批臭。在此前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联名上书毛泽东与林彪，拥戴毛出任国家主席。华北组简报出笼后，更多的中央委员纷纷给政治局写信，激烈声讨张春桥。事态至此，姑不论叶群与陈伯达（甚至林彪）等人的初衷如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又成了焦热的议题。（29）

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之重上议程，有几条值得强调。一者，从现有证据来看，笔者实在看不出改动全会议程，就一定为林彪出任国家主席铺路。迄今并无可信证据，表明林彪集团的任何成员为此目而活动。（30）史家王年一就曾明白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上，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提议林彪当国家主席。唯一的反证，就是于楠的文章提到某小组会议上有“个别人”说过：“如果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但有一说，也不足以证明林氏本人有罪。何况此“个别人”者，显非林系人马！二者，在整个争议过程中，只要涉及“如何对待毛主席”的情感问题，几乎全体到会者都责无旁贷地热烈拥戴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试看华北组里叫得甚响的，就是科学家的钱学森。而作家郭沫若在此亦不遑多让。当然汪东兴的态度更具代表性。汪毫不含糊地呼吁恢复国家主席一职，并声明这不单是他的个人意愿，也是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的全体愿望：“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以汪东兴这样与毛贴近、侍奉了数十年、而又以敏察及秉承主子意旨为第一天职的人物，居然如此，这就教人益加深信：即便是常伴左右的人，也拿不准毛泽东三番五次的推辞就必然是最后的定论。对此汪东兴后来辩解说：当听到陈伯达言及有人因听到毛不当国家主席而手舞足蹈时，他过于气愤，一时激动就把毛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31）其实，这一说辞只能愈加表明：在当时，连汪东兴也不大相信毛的推辞必真。毛在上山之前的五回指示，回回都是由汪亲自传达或亲睹批示。要说出于一时激动就忘光了圣上的五回指示，真可谓匪夷所思的出格奇事。显然，在庐山上出现的闹剧里，亦自有马屁无罪，拍者其罪的一面。在这点上，汪东兴与林彪等人并无二致。

鉴于国家主席问题的再度出笼，以及群情汹汹准备揪人的形势，江青便在8月25日上午带着张春桥、姚文元来见毛泽东。此刻紧张的局面，用毛的话来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而这次的聚会也就成了庐山会议的转折点。然而会上有多少人出席，到底谈了些什么，吾人都无从得知。唯一可知的，就是江青向毛叫屈：“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啦！”总之，毛当即决定给夫人撑腰。当天下午，他就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指斥陈伯达等人违反九大方针；下令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并收回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不准散发。此后两日，毛又责成周恩来、康生分头找吴法宪、李作鹏与邱会作谈话，批判他们的错误。毛本人也召来各路诸侯训话（包括找林彪谈话）。（32）毛泽东何以断然采取这一系列处置？个中原因，论者不一。大抵说来不外以下诸项：一，毛对于武人坐大之势，并不放心。二，有人胆敢违反毛会前指示团结的号召，又居然打乱全会议程。三，叶群一伙从事地下串连活动，违反组织纪律。四，有人居然不听使唤，纠缠国家主席问题，强加于毛。五，当然，还有毛与江青的夫妻关系。总之，在自家老婆与钦定接班人之间的庐山对垒中，由于毛泽东的出面干预与一打一扶，中国政治权力的天平，从此就倾滑向激进文人的一端了！

可惜以上诸条解释，并不足充分阐明毛泽东强烈的情绪变化，也没有触及到庐山会议的实质。庐山会议初期，叶群反对张春桥的动作，或可视为宗派主义的延伸，但迅即发展成一出曲折隐晦、大吐文草苦水的戏剧。会场上所爆出的“炸平庐山”之情绪，正是文革以来造成中共政治菁英分裂的各种不平之气的冲撞。这只消留意一下陈毅在庐山上的角色，便可测知。陈毅原是三年前抵制文革的“二月逆流”事件中的勇健人物，如今他又出场唱和陈伯达的发言，难道纯然为了热情歌颂毛泽东的天才么？难道只是为求政治上的自保吗？在笔者看来，陈毅之所以热切支持陈伯达，恰恰是由于后者所打击的具体对象正是先前“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激进成员张春桥。然而呼之欲出的更大对象则是文革本身。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容不得人们指手画脚。饱受文革之苦的老干部唯有拿文革运动的干将出气。对此，毛泽东显然嗅出了其中气味，这才决意在会议失控之前亲自出马，断然处置并保护张春桥与江青。与其说毛泽东要维护江青与张春桥，不如说是为了维护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如“二月逆流”之际，他看待任何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就是对他本人的攻击，如今谁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毛泽东。（33）职是之故，康生在毛的态度明朗之后，就气势汹汹地宣告：庐山上的这场斗争是“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之合流”（笔者按，“红流”者，疑是“洪流”之误；又一说“八月黑风”）；

是“二陈合流”（按指陈毅与陈伯达）。试想，庐山之争若非涉及了多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单单只为了一个事不关己的修宪条款，庐山上的老干部们会触发起那样的激切之情么？（34）

毛既已行动，全会上公开点名的批判，便集中在晦气的陈伯达身上。8月3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分别从理论和人品方面指斥陈伯达：批驳陈的“天才”观点；也指控陈在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便“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毛的短文打响了此后大半年“批陈整风”运动的第一炮。至于这位“马克思主义的骗子”，随即就遭隔离审查，其数十年的政治生命戛然而止。九届二中全会也于9月6日在毛泽东号召干部多读马列、多讲团结的讲话声中落幕。

注释：

笔者按，本文原撰于1997年，应香港城市大学罗金义教授之请而作。罗先生本欲主编一册有关中共文革高层政治的书，不悉何故，终无下文。近日翻检旧册，无意间触得此手稿。12年后重读此篇，除个别细节有些出入外，主体观点并未过时。不妨刊之于此，就教于读者。2009年4月附记。

（1）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页346—50；于楠：“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载《党的文献》，第三期（1992），页83—86；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Succession to Mao and the End of Maoism,”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剑桥中国史，以下简称CHOC), Vol. 15, pp 313—20; and Jurgen Domes,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s between Two Party Congress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1976) ch. 5; 毛泽东对庐山事件的定性，见之于他在1971年八、九月间的南巡讲话。另见Michael Y.M Kan (ed.), The Lin Biao Affair: Power Politics and Military Coup (White Plains: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5) pp 59—62。

（2）对于九届二中全会的简明概述可参上引MacFarquhar文 CHOC, Vol. 15, pp 313—20。

（3）见王年一：《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93—4，396页；和汪东兴：“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1994），页16—17。

（4）见MacFarquhar文，CHOC, Vol. 15, pp 319—20。

（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394，396；及焦烨：《叶群之谜：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与林彪》（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页340。

（6）此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页329。张谓林彪讨厌与洋人打交道，进而声称他在林办工作的四年间，林彪只接待过两次外宾。此说恐怕有点夸张，笔者检索当时中共官方的报刊，并有照片为证，显示在1967年5月至1970年9月期间林彪至少在19次不同的场合陪毛接待外宾。

（7）叶永烈：《陈伯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页478；于楠，《党的文献》，第3期（1992年），页83。

（8）根据笔者访谈的材料，叶群并未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话。识者以为这话其实是吴法宪于九一三事件后在专案组逼供下编造出来的。不过笔者也查到毛泽东在1971年夏南巡时就已有此说。毛言：“根据最新揭发的材料来看，叶群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动员一些人设国家主席，说这次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放在什么地方啊！”，“1968—197



1 年中共领袖言论集”，油印件，现藏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页 71。李志绥在《毛主席的私生活：毛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伦敦，1994，第 529 页）一书中也记载叶群说过类似的话。李声称汪东兴在事后透露叶群还在上庐山之前，就同汪打了招呼：要设国家主席，否则就没有林的位置了。无论如何，就算叶群说过，也不过反映了她本人想当“国家主席夫人”的意愿，未必就是林彪的意思。

〔9〕参看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93—4。

〔10〕笔者不妨把这一问题分开两个部分看待：即“设不设国家主席？”与“谁来当国家主席？”林彪之主张设国家主席，乃是基于中国传统与国际惯例之故虑，用他自己的话说：“国家总要有个头。”因此未必是他故意强迫毛出任，更未必是他本人有意占取。其实，在当时这一“位尊权寡”的职务最适合权力核心圈外的人，譬如董必武。果其不然，毛在当年 4 月间就提议过由董出任。林彪坠机后，董必武也实际上肩负起国家主席之职务。

〔11〕据姜华宣编《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之说（沈阳：沈阳出版社，1991 年），页 554，林彪出席了这次会议，但其他有关这一时期的史录，包括汪东兴的文字（见《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3 期，1994，第 16 页），都没有提到林的出席。此外，据张云生说，此时林在苏州养病，并不在京；见《毛家湾》，第 375 页。此处所述大体采自汪东兴之说，页 16。其与官方所称当时出席者“绝大多数”支持毛的意见一说，显然有别。

〔12〕对此，所有文字材料都明言“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但笔者所晤谈的某位专家则谓：在这次由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林彪的建议得到“全体一致的”支持。

〔1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92—94；于楠，《党的文献》第 3 期（1992 年），页 83；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3 期（1994 年），页 16；张云生，《毛家湾》，页 384；和 MacFarquhar, CHOC, Vol. 15, pp 313—14。

〔1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95—96。

〔15〕张云生，《毛家湾》，页 384—85。

〔1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384 页；及汪东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3 期（1994 年）第 16 页。

〔17〕于楠，《党的文献》第 3 期（1992 年），83—84 页；和肖思科：《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2 卷；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 年），卷 1，第 196 页。

〔18〕关于二中全会的情况，严谨学者于楠先生的文章（见《党的文献》第三期，（1992 年））为读者提供了极其详尽的记载，只可惜严守官方的解释观点。而关键人物汪东兴则以见证人的身份也提供了一个详细记录，其观点虽亦严守官方立场，但在具体细节上与于楠之文有所不同；本节中与官方谬反的某些见解则采自口述资料。

〔19〕于楠，《党的文献》第 3 期（1992 年），第 84 页。于楠误将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置于 22 日晚；实则此会召开于下午二时。晚间 8 时之会则为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常委排名低于毛、林的周恩来主持。

〔20〕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3 期（1994 年），第 11 页。

〔21〕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3 期（1994 年），第 12—13 页；及于楠，《党的文献》第 3 期（1992 年），第 84 页；汪、于二文如在细节记载上相抵触者，笔者采汪之说。

〔2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397；叶永烈：《陈伯达》，页 486；及口述资料。

〔23〕关于毛泽东事后翻脸不认账一事，最突出的事例，当属 1962 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刘的报告本是毛鼓励他做的，随之又以大纲形式获毛批准。但毛在后来“炮打司令部”时，反而指责刘少奇“1962 年的右倾”。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 404。

〔24〕于楠，《党的文献》第 3 期（1992 年），第 84 页；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 3 期（1994 年），第 13 页。

〔25〕叶群是否有此一说，尚难断言，尤其是此说源自吴法宪的话。但有一点可肯定者：庐

山会议伊始，国家主席问题就给重新端了出来，说明了这一问题在与会者的心思中远未了结。

〔26〕张云生，《毛家湾》，页397—98；叶永烈：《陈伯达》，第488页；谭宗极编，《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88页。又按，吴法宪在地区分组会议中，分在西南组，叶群和李作鹏参加中南组，邱会作则在西北组，而黄永胜则要在一周后才奉命上山。关于分组状况，各家之说有异，此处依据汪东兴之说，见《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1994年），第15页。

〔27〕《人民日报》，1978年5月18日；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1978年5月24号，第E11页。按，王洪文在会上也跟着起哄，热烈拥护林彪讲话。

〔28〕据接近陈毅元帅的人物告知：陈毅上山甫后，曾找汪东兴询问是否该在会上做点自我检讨。但汪回答说：“轮不到你，这回批别人。”这一插曲意味着汪与林彪集团间的某种唱和关系——即合力批判张春桥。这一联手，也是出于鄙视张春桥的军队将领和其他文人秀才们的共同心理。至少在汪东兴看来，打击张春桥这样的“党的野心家”是会符合毛之心意的。李志绥则认为汪东兴由于痛恨江青，故与林彪集团联手，李还强调在汪东兴的思路里，“跟林彪合作，也等于为毛主席做事。”二者之间并不冲突。见《毛主席的私人生活》页511，519，522。

〔29〕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398—99；于楠，《党的文献》第3期（1992年），第84—85页；《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617—18页；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1994年），第14—17页；谭宗极：《十年后的评说》，第89页。据于楠文章84页所述，叶群曾布置吴法宪等将领在24日晨的分组会议上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

〔30〕不管是李作鹏或是邱会作，他们在大区分组会议上的发言，都把“反对毛主席”与“反对林彪”连系起来看待。见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页15。

〔3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399；于楠，《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页85；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页16—17；李志绥，《毛泽东的私生活》页519，529—30，及口述材料。关于汪毛二人关系，可参看李志绥书，特别是页9，49，126，184—86。

〔32〕于楠，《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页85；汪东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页17—18；及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402—03；毛泽东也与黄永胜谈过话。黄是稍后在8月31日抵达庐山的，上山前据说烧毁了原先准备拥护林彪讲话的稿子。毛找之谈话时，劝他“好好学习”。

〔33〕此一看法亦可证之于一年后毛南巡期间与华国锋的谈话中，见“1968—71年间中共领袖人物讲话录”，油印件，现藏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页71。

〔34〕《陈毅传》，页616—18。

~~~~~

## 【文革一页】

1968年：中国“五七”干校之滥觞

• 李城外 •

40年前，神州大地涌现一种特殊的“学校”，一批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等被下放到农村，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40年后的今天，不少耄耋老人在后人的陪同下重访当年被下放接受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的地方。

这种特殊学校就是“五七”干校，这些耄耋老人就是当年的“五七”战士。

#### ◇ “五七”干校始作俑者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读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毛泽东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由此可见，“五七”指示的下达比《五一六通知》的形成还早一天，足以证明它和“文革”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68年初春，黑龙江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提出，要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精神，办一个“五七”干校。不久，该省革委会召开第76次常委会议，批准成立柳河“五七”干校，并于5月6日正式下发了有关文件。5月7日，欢送首批学员进驻庆安县柳河。这样，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应运而生。

柳河干校共有学员504人，主要由原省直机关干部组成。他们到干校后，按照“五七”提示中“学军事”的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伙食按部队标准每人每月12.5元，吃集体食堂。建制按工种分为农业、基建、工业、畜牧、后勤五个排。干校共耕种土地3000余亩，还发展牧、渔、副各业，并自力更生办了小型工厂。“五七”战士们白天投入紧张繁重的田间劳动，或从事基本建设、修路、养鸡喂猪等生产，晚间则以班组为单位办学习班、开讲用会，选学毛主席语录和报刊文章，联系劳动和思想实际“斗私批修”，剖析自己……

1968年5月12日，校部编印出版了《五七战报》的创刊号。不久，还组织笔杆子写出一篇万余字的调查报告，总结了柳河干校的创办情况，题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思想革命化的重要途径》。该省革委会收到后马上批转下发，同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和沈阳军区，后交《黑龙江日报》全文发表。9月30日，此文得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

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说，干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头等任务来完成”，“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当时，《人民日报》在该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由于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公布，“五七”干校在华夏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迅速引起高度肯定和普遍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各省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落实计划，坚决贯彻执行。

当时，黑龙江省召开数万人的誓师大会，宣布全省县以上革委会都要办“五七”干校。不久，全国各地大批人员赴柳河参观学习、取经。从1968年10月起，全国出现一个兴办“五

七”干校的高潮。

1969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又推出《关于如何办好‘五七’干校的讨论》专栏,开篇之作便是柳河干校的专文。到1970年9月,全国前来参观的已达1300多个单位,1.8万人次。

#### ◇ 可圈可点的全国“五七”干校现象

由于柳河这一典型的广泛影响,各地纷纷响应“五七”指示,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成了干校中的“五七”战士。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均创办了“五七”干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他的同事们来到河南潢川黄湖农场,和干校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担任了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被下放到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干校长达5年;现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曾在江西奉新一机部“五七”干校劳动,度过了近3年的艰难岁月……

据有关资料,当年中央一级机关在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开办“五七”干校,知名的有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干校、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上海奉贤干校、湖北沙洋干校等等。仅息县一地,就有铁道部、全国总工会、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中科院学部等七部委整体“落户”,形成了罕见的“五七”干校群。在学部下放的知识分子中,包括俞平伯、何其芳、顾准、钱钟书、孙冶方、吴敬琏、冯至、李健吾、卞之琳等学术名流。

许多“五七”干校成立之初,都提出了生产自给的目标,其中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干校最为典型。这是汪东兴亲自抓的全国干校示范点,地址在江西省进贤县五里垦殖场,下放干部约有1600多人,有办公厅秘书局、警卫局、中央档案馆等10多个连队。他们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口号。1969年初春建校,当年收获水稻163万斤、籽棉4.5万斤、花生4.7万斤、养猪500口,实现了粮、油、棉、肉、菜“五自给”,并提出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他们还要求学员打硬仗,打苦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连毛泽东主席之女李讷也是普通的“五七”战士,并在干校结婚;1972年春,邓小平曾到此看望过去的老秘书王瑞林。中办干校撤销于1979年,为期12年之久。

很快,各省开办的“五七”干校有1497所。仅以河北为例,截至1969年底,全省共办100多所,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又如,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斗士张志新便是被下放在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她在那里开始痛苦的思索,对“文革”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肯定了“五七”干校创建以来的成果,总结办校经验,要求进一步认识办干校的意义,明确发展方向,把干校长期办下去。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报告》说,两年来,中央机关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有近90000名干部、10000名工勤人员、5000名知识青年、30000名家属,共13.5万人到干校学习和劳动。《报告》还对干校的发展方向、任务以及一些具体工作提出了意见,要求各地干校作为参照。

#### ◇ 鄂南“向阳湖”成为干校的“文化名片”

很快，“五七”干校这个“新生事物”被一条“最高指示”推广到了全国。在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中，鄂南咸宁向阳湖干校因为聚居的文化名流最多、文化人知名度更高而颇有特色，成为干校中的“文化名片”。

1969年至1974年间，原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文博专家、电影工作者及家属6000余人到咸宁向阳湖接受劳动锻炼。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汇集于鄂南的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构成了当代文化史上的奇观。被下放向阳湖的知名人士就有：冯雪峰、沈从文、冰心、郭小川、臧克家、张光年、刘继卣、范曾、刘炳森、周巍峙、陈翰伯、单士元、徐邦达、史树青、罗哲文、周汝昌等一个个响当当的“文化符号”式的人物。泱泱文化大军驻扎荆楚“南大门”，实为罕见。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文人不幸咸宁幸”。

当年，咸宁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驻校军代表全面领导，下设5个大队、26个连队。文化部的各下属单位大都是被“连窝端”下放咸宁干校，可以说，在北京重要的文化机构里基本上都有当年的“向阳湖人”。在极左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文化人集中向阳湖这一点，是任何地方所不及的。

咸宁干校总部设在甘棠，先遣队于1969年4月12日到达向阳湖。1969年9月26日，第一批大队人马离京下放咸宁，12月19日，来了第二批；1970年5月18日，又下放第三批。建校之初，在咸宁高中设有中转站和子弟学校。此外，还在武昌金口、乌龙泉两地设有家属连；驻扎在汀泗桥的十三连（人民出版社）烧石灰窑，在双溪的二十六连（新华书店储运公司）挖煤。干校劳动主要是围湖造田，搞粮、油、肉、蛋“四自给”；同时搞学习与批判，有一段开展深挖“五一六”运动。一年之后，一批老弱病残约百余人转到鄂西北的丹江分校。干校初期是北京军区驻校军宣队主管，1970年6月2日，改由湖北军区军宣队接替。1974年12月底，咸宁干校被解散，合并于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原河北省静海的团泊洼（现属天津）。

由于文化人云集，在咸宁干校留下了许多逸事，种种酸甜苦辣不一而足——

无奈的事：在干校，军宣队许多做法不近人情，他们一到咸宁就称自己是“飞鸽牌”的，文化人是“永久牌”的；文化人家属寄来一点副食，他们就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收缴并展览，以一儆百；当时干校流传着许多顺口溜，如“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晴不干——搞大批判”；“五七宝，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每人一块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棍，三步两跌倒”；“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等等。

有趣的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严文井在干校先后担任副班长、排长、连副指导员，他自嘲在咸宁“连升三级”；著名画家许麟庐在向阳湖先是放鸭，后来改为养猪、放牛，他戏称自己的“官”越做越大；中华书局一帮学者在干校生活枯燥无聊时，议论谁人“惧内”（怕老婆），并进行排队，自发成立了“惧内协会”（简称“惧协”，与剧协谐音）。

感人的事：干校人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仍保持难得的闲情逸致，刻竹简，编印《向阳湖诗选》，举办美术摄影展览，彰显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长征老干部冯雪峰解放后受到不公正待遇，一直到干校还挨斗挨批，但他劳动任劳任怨，从不偷懒。当时尽管有整过他的“大人物”亦遭大难，可他并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曾严辞拒绝别有用心的人要他写整过自己的人的伪证材料，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郭小川在干校受到江青迫害，但他不服高压，后来从咸宁转到静海干校，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秋歌》和《团泊洼的秋天》，被视为当时文

坛首次唱出的叛逆之歌。

值得记载的大事：咸宁干校创办后，众多文化人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他高瞻远瞩，指示只转干部的粮油关系，不转户口，为他们日后调回北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 当年的“新生事物”成为历史名词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风靡一时的“五七”干校悄然降温，开始陆续有人回城重新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五七”干校毕竟风光不再。直到1979年，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国务院于2月17日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干校寿终正寝，成了历史名词。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五七”干校这段历史注定要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向阳湖文化”可谓不可多得、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2000年6月，咸宁市成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这是全国唯一研究“干校文化”的群众社团，研究会编辑出版有关书报、拍摄专题片、发行纪念封、建立网站，着力打造一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两年后，“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俱往矣！2008年初夏，时值柳河“五七干校”创办40年之际，柳河“五七”干校原校部负责人之一战风翰等18位老同志回访故地，百感交集……

“五七”干校不应被人遗忘，也没有被人遗忘。它留下了对沧桑岁月的叹息，渗透了对荒唐“文革”的反思，愿更多的人们赶往那历史的现场呼吸！

□ 《中华儿女》2008年第6期

~~~~~

【名人轶事】

张春桥与王洪文鲜为人知的“婚事”

• 沈国凡 •

最近，我在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访中，他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张春桥——离婚与权力的梦想

◇ 一同破灭

张春桥将老婆留在上海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

张春桥为何要这样做呢？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获，后来自首，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到处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

1946年张春桥与文静结婚。

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

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

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

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张春桥这次是下了狠心的，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扔掉脑袋。

历史没有朝着“四人帮”策划的方向走，但是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们一伙相互勾结的罪恶目的究竟是什么了。

北京是个什么地方？那里是中国的高官集聚之地，对于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特别是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层的人来说，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只要人们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

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这样处理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 约见王洪文秘书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下去，那也会是前途无量。可是，自从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他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晚上，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看到一向善于掩盖自己内心的张春桥，面容有些忧郁，神色有些不定，两个人的谈话没有了昔日的气氛，语调低沉，表情阴暗。

张春桥谈了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馆，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做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键是由谁来当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肖木从张春桥的长谈中，感觉到了一种悲伤，一种预感，一种即将灭亡时的绝望和挣扎。

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看来，与张春桥相比，肖木还是太嫩了。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

这时的张春桥是想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好再次高升以后另寻新欢呢，还是真的害怕因自己出什么问题将来牵连到老婆儿子？

总之，张春桥再次提出与老婆离婚的问题，已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

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时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着“四人帮”的迅速覆灭和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沉默不语，这一切都永远地成了



一个谜。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

他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肖木这才发现，这位从上海来到北京高升了的“政治局常委”，除了考虑个人的权力之外，对于个人的幸福也是同时在考虑之中的。

一向自认为很“正派”的张春桥，在他的这个同伙眼中一下子变得有些虚伪了。肖木的回答明显带着几分不满：“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是要坚持离婚？”

张春桥根本不把肖木放在眼里，他显得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惋，几分凄凉。

张春桥将自己的家事和国事连在一起：“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 ◇ 张春桥的离婚梦破灭

在此之前，姚文元已将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仿佛有所预感，提出将孩子送回上海去。可是，这事却遭到了老婆金英的反对。

张春桥对姚文元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肖木谈到此事时，张便说：“这件事情上怎么能听老婆孩子的呢？本来他就不该将他们接到北京来，留在上海总要放心一些，遇事也好有个照应。在这里，搞不好就会被一窝给端了。”

肖木惊诧：“谁敢，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张春桥朝这位年轻的小兄弟苦笑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主席去世了，现在各种思想的人都会出来的，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肖木问：“能有那么严重？”

张春桥显得有些沉重地说：“你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每天都是穿着衣服睡觉，随时都准备着有事情发生。”

肖木这才醒悟过来，对张春桥说：“你这一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如果真有人想篡党夺权，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张春桥苦笑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这就要看到时候谁的力量大了。”

肖木这时才领会张春桥刚才云山雾罩地给他讲的那些话，于是就说：“我们有上海的民兵武装，好几十万的人，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是听你春桥同志指挥的。”

张春桥这才说：“所以我对文元说，还是将老婆孩子留在上海好，那里有我们的人，好关照。”

多年来，张春桥一直为离婚的事情弄得发愁，加之他考虑的事情比“四人帮”中的其他几个人要多得多，一张脸总是像苦瓜一样地“挂”着。当肖木说到上海民兵时，他这时才露出了一丝笑意，不过很快又收住了。

张春桥对肖木说：“所以我叫你来，临去上海之前好好地谈一谈。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工人阶级最集中，现在我们又将他们武装起来了，那还怕什么呢？所以我让你将这些意见带给马老他们，使他们能尽早地做准备，要经受一场更大的考验，要做好打仗的准备，要把我们自己的力量抓好。”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四人帮”中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没过几天“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

人们对此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与年轻一点的王洪文相比，张春桥的离婚恐怕算的政治账要多于生理账。肖木到达上海不久，张春桥的老婆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枝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

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心中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

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一趟北京。

几天之后，“四人帮”被粉碎，张春桥的离婚梦也随着他的覆灭而从此破灭。

#### ◇ 拘捕张春桥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张春桥的贴身警卫员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军人，人们习惯地称他为“大熊”，陕西人。张春桥平时很喜欢这个警卫员，这个时候，他正在家乡休假，被张春桥突然招回了北京，外出时寸步不离。

张春桥接到开会的通知后，就带上“大熊”来到怀仁堂。二人刚走到门口时，等候在此的第一行动小组负责人纪和春迎上去，向张春桥行了一个军礼。

张春桥板着脸，冷冷地问：“国锋同志和叶帅到了吗？”  
纪和春答：“到了，他们正在等你。”

于是，纪和春就引着张春桥朝里面走。

这时，“大熊”也跟在后面，想随张春桥一同进去。

门前的两名卫兵立刻将“大熊”拦住。

张春桥这时回过头来，有些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纪和春回答说：“没有什么，首长们开会，随行人员按规定都在外面的大厅里休息。”这一说，张春桥也没有办法，就只好对自己的警卫员点点头，独自跟着纪和春进去。

当他们推开“会议室”的门时，从门后突然冲出几个人来，将张春桥一下子扭住。

张春桥立刻大叫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在前大厅被拦住之后，就被带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去休息。他进门一看里面都是警卫局的熟人，就向大家点点头，然后泡了一杯茶，独自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喝起来。

可是，他喝茶是假，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是真。他这时突然站了起来，就要朝里面走。

警卫团一名副团长朝屋子里的行动小组人员使了个眼色，行动小组的这几个人就要冲上去缴“大熊”腰上的手枪。

“大熊”后退一步，一下子拔出手枪。

昔日警卫团里的熟人，此时“各为其主”，怒目相视。

如果双方发生枪战，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粉碎“四人帮”的计划！

那位副团长对“大熊”大声地命令：“放下武器，中央已决定逮捕张春桥！”

这是令“大熊”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先愣了一下，接着就说：“我只听汪（东兴）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只好给汪东兴打电话，并将话筒递给“大熊”。

听完汪东兴电话后，“大熊”回答说：“是！我服从命令！”

“大熊”将攥在手中的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前面的大厅里，一场剑拔弩张的“警卫员之战”终于结束。

“会议室”里，被行动小组人员扭住的张春桥，对坐在沙发上的华国锋和叶剑英大声地喊着：“你们这是干什么？”

华国锋这时站起来，拿出一张“决定”来，对张春桥念道：“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张春桥听完后还想反抗，被纪和春上来给戴上了手铐，然后从后门将他押走。

历史老人总是这样及时地惩治邪恶，张扬正义！

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 王洪文向妻子提出离婚

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担任党的副主席之后，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

有人说，这是王洪文地位变了，看不起仍然还在工厂里做工的妻子了。

也许这是一个原因，但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真是奇怪，“四人帮”中从上海进京的3个人，竟然有两个都曾提出过要与妻子离婚。

也许王洪文早已预感到了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就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连广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顾的男人呢？

她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王洪文的发迹，完全是得益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栽培。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1月2日，张春桥电召王洪文进京。

1月3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秘密召见王洪文。

在听取了王洪文对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张、姚指示他，必须迅速回到上海，对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夺权。

1月4日，王、张、姚3人飞回上海。上海文汇报社在全国率先开始夺权。

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宣布夺权成功。

在把持了宣传舆论工具之后，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幕后策划下，王洪文、徐景贤等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

于是，新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班子开始形成，张春桥担任主任，总揽上海党、政、财、文大权，姚文元担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担任了副主任。

从此，王洪文这个极不引人注目的“小兄弟”，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一手栽培下，开始步入中国政坛。

在张、姚、王的一手策划下，全国上下开始向地方党委和政府夺权，王洪文则成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的一个标志性代表人物。

1972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调王洪文进京。

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选为党的副主席，登上了个人权力的顶峰。

从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一个干事，一下子成了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深深地明白，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帮助”的结果。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得紧紧地依靠这两个人。

而这两个人在他之前早已与江青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王洪文进京不久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虽然职务一下子跃上张、姚之上，但对这两个人的“知遇之恩”，他是感激万分的。对于江青，因为她的头上有一道“第一夫人”光环，为着共同的利益，王洪文也就很自然地成了这个小团体中的一员。

于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具有时代特色的一个名词出现了——“四人帮”。

“苦出身”的王洪文自从登上权力的峰巅后，生活上更是奢侈。据有关资料记载，王洪文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有9辆汽车。到外地“视察”时，他嫌坐的三叉戟飞机太小，要坐707，睡前要喝一次西洋参汤。他喜欢打猎，就硬要有关工厂为他制造“奇异牌”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生产，来为他日夜赶制。最后造了20只，他却只选了两只，耗费国家资金是当时的1万多元。又为他专门精制了5块高级钻石牌日历手表，调动7个工厂和1家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1.1万多元。他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研制这个杯子的高档盖就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专门制造了两套模具……王洪文的生活开始腐化。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以后邓小平复出，大刀阔斧地开始整顿工作，使在一片混乱之中的各行各业，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效。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动摇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根据中央的安排，此间的王洪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的时间作调查研究。

1976年1月，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

王洪文认为机会来了，他将当时的秘书肖木叫来，要他写一篇讲话稿，准备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自己登台“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从而达到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目的。

这个报告完成后，王洪文又作了修改。就在他将第二次修改的稿子送印刷厂，并准备出三稿的时候，他却将自己的这份“报告”悄悄地收起来了。

原来，197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的美梦破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2日——离“四人帮”的覆灭还有4天，王洪文还在做着他的篡党夺权以及离婚的美梦，他洋洋得意地为自己拍了好几版的“标准像”。

用王洪文自己的话来说，他这个连最基本的马列主义常识都不具备的人，是靠着“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的。

“四人帮”的其他3个人，也都承认王洪文是一个不理“正事”的“白相人”。

这时，王洪文对离婚的事情向妻子催得更紧。他不但让自己的秘书去做劝说，同时还让他在上海的余党去帮着做这件事情，并答应了崔根娣孩子归女方的条件。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后，曾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正当王洪文满怀希望准备离婚时，形势却发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

## ◇ 抓捕王洪文惊天动地

抓捕王洪文的时候，却不像江青那么容易。

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正厅。

早已等候在此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平静地坐在那里。

在此之前，汪东兴将写好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交给了华国锋。

具体的抓捕，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实施。

张春桥先到，很快就解决了。

王洪文接着就到了。

因为考虑到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文人不一样，他年轻，当过军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时候，行动小组的卫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将他扭住。

王洪文一下子没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声地吼了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来开会的！”

卫士们仍然不肯放开他。

王洪文急了，立刻奋力反抗。

他一边用脚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动小组的卫士，一边拼力将手挣脱，并向卫士们挥动起拳头。

行动小组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很快就将王洪文制伏。

王洪文被扭着双臂来到大厅里。

华国锋站起来，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还未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挣脱开卫士的手，大吼一声，如同一只发怒的恶狼一样，张开双臂，向着不远处的叶剑英扑去。

站在一旁负责这项抓捕工作的汪东兴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枪，接着又将手收了回去。因为双方太近了，实在是不便于开枪。

没有念完“决定”的华国锋，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惊诧了。

叶剑英毕竟是久经风雨的老帅，显得很镇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在王洪文距离叶剑英只有1米左右的时候，几名卫士冲了过去，用力将他扑倒，然后死死地摁住，并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王洪文还想挣扎。

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连揪带架地将王洪文抬出大厅，然后拉进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从一个既无安邦之策，又无治国之才的造反派头头，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王洪文，从权力的巅峰上跌了下来。

◇ 每年国庆节妻子都来监狱探望王洪文

在审判“四人帮”之前，党中央决定在这四条“腿”中先“断”其一条，使其失去平衡。由于王洪文资历最浅，又全是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因此决定先“断”王洪文这条“腿”。

在经过预审时的反复较量之后，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态度明显好于其他3个人。

在对王洪文的最后一场法庭辩论时，公诉人发言结束，曾汉周审判长对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你可以行使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权利。”

接连不断的法庭对质和辩论，已经将王洪文所犯罪行揭露得体无完肤，他这时稍微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坐在审判台上的几位法官，又将头低了下去，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在法庭调查中，王秀珍在作证时，提到我曾经说过‘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这话我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当时是说林彪控制军队那么多年，许多部门和单位都被他的死党把持着，没有我们的人，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

为了慎重，审判长曾汉周与审判员王战平、曹理周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辩论结束。王洪文，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有什么要讲的吗？”

王洪文最后说：“我只讲几句，我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实，以及大量证据，都是事实。这些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已经如实作了回答。就今天这个机会，我向法庭表个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成了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经过几年来的反省和交代，特别是在公安预审和检察院的调查过程中，使我逐步认识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我个人在这个集团里面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严重的，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恶滔天。我是这个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我的罪行是大量的，严重的，同样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我犯下了参与诬陷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组织帮派武装、煽动民兵武装叛乱等严重罪行。我在这里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认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里边很深，罪行严重，完全转变立场还要有个过程。但是我有决心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陈述完了。”

王洪文作了最后的陈述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王洪文退庭，等候最后宣判。”

经特别法庭所有审判员对罪犯逐一进行评议，然后逐一进行表决，特别法庭最后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令王洪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被关入秦城监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每年国庆节这一天，他曾妄图离掉的结发妻子崔根娣，都要带着他们的孩子从上海赶来探监，因为这一天是她与王洪文



的结婚纪念日。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对找她谈话的领导异常平静地说：“王洪文犯了罪，你们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离婚。他还年轻，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崔根娣和女儿王亚萍经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体检时发现患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 《文史精华》2009年第3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